

汉维语言中的性别歧视及其社会文化内涵

潘存梅

(伊犁师范学院 中国语言学院,新疆 伊宁 835000)

[摘要]性别歧视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语和维吾尔语中都存在大量的性别歧视现象。语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及人类最主要的交际工具,直接反映出语言使用者的社会价值观、民族的文化积淀和思维方式。本文对汉维两种语言中存在的性别歧视现象进行了研究,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为今后的学习者在理论上提供依据。

[关键词]汉维语言;性别歧视;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H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10-0065-03

语言与社会相互依存,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语言其实是现实世界的一面镜子,现实社会的种种现象都被它尽现其中。正如英国语言学家帕尔默所说:“语言忠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在人类社会早期,社会多是被男性统治着,而妇女多处于附属地位,所以歧视、贬低妇女的现象大量存在。尽管当今社会人们越来越关注男女平等问题,也一直致力于提高妇女的地位和权力,性别歧视却仍然存在,并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人类的语言中。无论是在汉语还是在维吾尔语中,都存在着大量的性别歧视现象。本文主要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对汉维两种语言在称谓语、词汇和谚语、俗语等方面出现的性别歧视现象进行对比研究。

一、称谓语中性别歧视的表现及其异同点

称谓语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和维吾尔语都有各自的称谓语。在称谓语的使用上,汉语和维吾尔

语既有相似的一面,又存在一定的区别,下文对性别歧视在汉、维称谓语中的表现及其异同点进行论述。

(一)性别歧视在汉语称谓语中的反映

姓名是一种人和人之间相互区别的标志性符号,由姓和名两部分构成。在汉语中,“姓”由“女”和“生”组成,它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当时人们的姓由母亲的姓决定,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妇女的地位逐渐降低,并开始依附于男性,最终父系氏族社会取代了母系氏族社会,因而,人们的姓也就开始由父亲的姓决定。在古代,许多妇女不仅被剥夺了命名权,而且连拥有名字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女性在结婚之前一般被称为“丫头”、“妞儿”,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女性的名字一般比较注重阴柔之美,姓名中常带有婷、丽、静、琴等字,而男性的名字一般比较强调阳刚之气,姓名中常有军、杰、磊、勇等字。

除此之外,人们对女性的歧视在婚俗上也有所体现。

正如美国著名翻译家尤金·奈达所说:“翻译的根本问题并不是语言的差异,而是文化的差异。”若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译者,必须了解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信达雅”长期被我国广大译者视为翻译标准。其总体目标是用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来传达相同的信息,翻译的最终目的就是

根据文化背景的不同,在考虑到目的语读者需要的基础上尽可能忠实于原文。离开了文化翻译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对于翻译者来说,最正确的态度是把汉维文化背景有机地结合起来,再辅以适当的翻译技巧,通过不断的努力使自己的翻译臻于完美。

[参考文献]

- [1]张琴.试析文化空缺及其翻译策略[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12).
- [2]马红湘.语言文化空缺与翻译策略[D].湖南师范大学,2001.
- [3]包惠南.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2001.
- [4]王秉钦.文化翻译学[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

- [5]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 [6]鲁迅.呐喊(维吾尔语)[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9.
- [7]廖泽余,马俊民.汉维词典[Z].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
- [8]方梦之.中国译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 [9]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在古代中国,由于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女人一般用较卑微的称谓自称,如“奴家”、“贱妾”等,而称呼自己的丈夫时则用敬称,如“夫君”、“郎君”、“官人”等。而男性则称自己的妻子为“贱室”、“内人”等。在正式场合,男性一般称呼自己的妻子为“夫人”、“爱人”,但在条件相对落后的农村,还有“烧火的”、“孩子他妈”、“那口子”、“屋里头”等叫法。

在旧中国,未结婚的女性常用“氏”来称呼,如:“王氏”、“张氏”,结婚之后,则在其前面加上丈夫的姓,即“张田氏”、“李王氏”等,如《红楼梦》中的“薛王氏”。

(二)性别歧视在维吾尔语称谓语中的反映

在人名文化中,维吾尔语注重音韵美,女子姓名多以“gyl”(花)、“aj”(月亮)等美好的事物名称为首选,如“ajgyl”(月亮花)、“ajnur”(月光)、“roʻfengyl”(明亮的花)、“gyl bahr”(春花)、“gylʃen”(花园)等,希望女性能像花一样美丽、可爱。同时,我们也不难发现,维吾尔语对女性的命名是以其容貌特征为中心的,而并非其内在的品质、修养。而男性在取名时却有截然不同的标准,他们的姓名多与权力、力量相关,从一个人的品行、毅力入手,远远超越了对容貌的期望。如:“ʁalip”(胜利)、“sadiq”(忠诚)、“qudiret”(伟大)、“dolqun”(波涛)、“alim”(科学家)等。男女姓名的选词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对女性的歧视跃然纸上。

同时,与汉民族一样,维吾尔族在婚俗方面对女性也存在偏见和歧视现象。在维吾尔语中,除了有“toj qilmaq”(结婚)一词,对男性和女性还有专门表示“结婚”意思的词。如男性结婚在维吾尔语中说“xotun almaq”(娶妻)、“oʻjlenmek”(成家),女性结婚是“jatliq bolmaq”(过门、出嫁)。另外,“出嫁女儿”在维吾尔语中还有另一种说法,即“qizni ergic bermek”(把女儿给男人)、“qizni ʃiqarmaq”(让女儿出去)。可见,在维吾尔族的婚姻关系中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的还是男性。

(三)性别歧视在汉、维语言称谓语上的异同点

称谓语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特征。汉语和维吾尔语称谓语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是一种客观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以伦理为主的社会文化系统。不管是在姓名上,还是在婚俗中,都充斥着对女性的歧视和贬低。无论是汉语,还是维吾尔语,在其姓名文化中,对女性的命名都是以容貌特征为中心的,而对男性的命名则充满了更高的社会期望值。在婚俗中也是如此,男性永远都是处于主导地位,拥有对婚姻的主动权,而女性则永远处于第二位,是婚姻的被动接受者。

与此同时,汉、维语言在称谓语的表达上也存在一些

差异。汉语是一种表意文字,可以通过汉字的字形观察它的意义。通过以形显义的汉字可以容易地了解汉民族的语言世界和文化。而维吾尔族的语言却不具有这一功能,它只能通过添加一定的附加成分,构成一个新的词组来体现它所表达的意义。

二、性别歧视在词汇上的反映及其异同点

词汇是构成句子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词汇在句子中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下文对性别歧视在汉、维词汇上的体现做相关的归纳。

(一)性别歧视在汉语词汇中的体现

在汉语中,指代男性第三人称单数时用“他”,指代女性时用“她”,指代男性第三人称复数时用“他们”,指代女性时则用“她们”,但是在指代不明时,依然要用“他们”,也就是说此时的“他们”中既包括男性,也包括女性。从这些代词的用法我们不难看出,女性依然是一个受歧视的群体。

在汉语中还有一些职位名称,如科学家、局长、法官、主席等,在未作特别说明时,一般指的都是男性,如果是指女性,一般会在其前加上“女”字,如女局长、女科学家等。这些也都充分说明了女性是被受忽略的群体。

汉语词汇的先后顺序一般是男性处于第一位,女性处于第二位,即先男后女。如:夫妻、公婆、爹娘、儿女、夫唱妇随、男耕女织、男婚女嫁、男盗女娼等,这些无一不反映出男尊女卑的思想。

二、性别歧视在维吾尔语词汇中的体现

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语言世界里,女性作为一种客体,成了一个被界定的东西,远离了女性主体,这是男性想象的结果。如:“adem”一词在维吾尔语中的本义是“人”,此外还表示“丈夫”和“成年男性”的意思,如:女性常用“bizniq adem”(我们的人)来表示“我的丈夫”,又如:“sizni bir adem izdep keptu”(有一个人找你)中的“bir adem”(一个人)一般指“成年男性”,如果指成年女性,会特意这样说“sizni bir ajal izdep keptu”。此外,“bala”一词在维吾尔语中泛指“孩子、儿童、娃娃”,但“sizni bir bala izdep keptu”(有一个娃娃找你),这里“bala”一般指男孩,若指女孩,也要特意这样讲“sizni bir qiz izdep keptu”。由此可见,在维吾尔语的日常交际中,泛指两性的词语有只指称男性的趋势,同时,这也说明在大多数情况下,女性被认为是跟在男性后面的第二性别。

在维吾尔语中,还有一些词在形式上虽然没有明确表明是指代男性的,但是人们也习惯性地把它们当作指代男性的词看待。如“padijah”(皇帝)、“vali”(专员)、“bafliq”(首长)、“sotʃi”(法官)、“vezir”(宰相)、

“hakim”(县长)等。根据人们的一般思维模式,这些词语在大多数场合下指的都是男性。若指女性,一般会在前面加上“ajal”(已婚女性)或“qiz”(未婚女性)等标志性的词。如:“ajal padifah”(女皇帝)、“ajal sotfi”(女法官)、“ajal bafliq”(女首长)等。一般情况下,都不会在其前面加“er”(男)一词,也从未见过“er sotfi”(男法官)、“er bafliq”(男首长)等诸如此类的说法。这些词的用法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一般都为男性所有,女性则很少。

在维吾尔语有关男女性别的词汇中,词素结构在顺序上总是男性在前、女性在后。如“er-ajal”(指成年男女或夫妻)、“er-xotun”(夫妻)、“ata-ana”(父母),但也有例外,如“qiz-jigit”(姑娘、小伙子,有时特指新娘新郎)、“qiz-okul”(青年男女)等,这类词是约定俗成的,它的顺序一般不可以随意颠倒。总的来说,人们对语序的心理反应往往是先男性后女性,在维吾尔语中也是如此,即女性次于男性,是男性的附属物。

(三)性别歧视在汉、维词汇上的异同点

汉语和维吾尔语分属于两大不同语系,使用这两种语言的人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但是由于都生存在“人类”这个大家族中,具有相同的进化历程,同时也具有相同的思维方式。因此,两种语言在词汇的表达上也具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即歧视女性的观念是一致的。

尽管汉、维语言中都存在歧视女性的观念,但是二者在表达方式上还是有差异的。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是一种表意文字,它在构词方面的性别歧视主要体现在:一些贬义词是通过加“女”字旁体现的。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是一种黏着语,它是由一个一个的字母连接而成,因此不存在添加偏旁一说。

三、性别歧视在谚语、俗语中的体现及其异同点

谚语、俗语是民族个性和文化气质的充分体现和展示。“谚语跟各民族特定的历史、经济、生活、风俗习惯、物产风貌、自然环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具有民族性,文化的内容通过民族的形式反映出来。谚语依存于民族的社会生活,它们必然带有本民族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采用独特的表达方式表达独特的思想观念。下面

就性别歧视在汉、维语言谚语、俗语中的反映及其异同作一简单的阐述。

(一)性别歧视在汉语谚语、俗语中的反映

汉语中的性别歧视不仅体现在词汇上,而且在谚语、俗语中也有体现。谚语、俗语作为特定的汉民族观念意识的产物,既存在着性别差异,又表现出了传统的封建思想和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子无才便是德”、“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女人舌头上没骨头”等。从上面的例子,我们不难看出,女人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只能“随鸡、随狗”;也没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即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也只是浅显的“妇人之见”而已,是根本不会被人们重视的。

(二)性别歧视在维吾尔语谚语、俗语上的体现

“qiz bala degen taling adimi.”(女孩是外人)、“qiz balaaj-zinniti.”(女娃娃是屋舍的点装)、“xotunni pikiri-fejtanka ders.”(女人的意见——魔鬼的经书)、“xotun kifi-tot tamni quli.”(女人——四堵墙的奴隶)、“qizi barni nazi bar.”(养女人家苦楚多)等,这些都无一不渗透出男尊女卑的思想。

(三)性别歧视在汉、维谚语、俗语上的异同点

谚语、俗语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它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是一种民俗的记载。虽然汉、维语言分别来自两个不同的民族,但这两个民族对女性的同一看法——歧视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不同的风俗习惯会产生不同的谚语。汉语作为汉民族的语言,有它自己约定俗成的说法,而维吾尔语作为维吾尔族的语言,同样也有自己的说法。如:在汉语中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女人当家,房屋倒塌”的说法,而在维吾尔语中却没有这样的说法。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语言中所折射出的性别差异和性别歧视并不是由语言符号本身的属性决定的,而是特定社会价值观念和民族思维方式在语言中的必然反映。⁷因此,汉、维语言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并不是汉、维语言本身的过错,而是由社会或使用此类语言的主体——人所决定的。相信伴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语

[注 释]

- ①郭艳涛:《浅析英语语言中的性别歧视现象》,《洛阳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6期。
- ②姚丽萍:《英汉传统文化中的性别歧视现象》,《考试周刊》,2007年第32期。
- ③王志强:《汉语称谓中的性别歧视现象》,《语文学刊》,2000年第1期。
- ④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 ⑤艾尔肯·哈德尔:《试论现代维吾尔语中的性别歧视》,《语言与翻译(汉文)》,2008年第1期。
- ⑥钱进:《成语和俗语性别差异的文化透视》,《语言与翻译(汉文)》,2003年第2期。
- ⑦秦秀白:《英语中性别歧视现象的历史文化透视》,《现代外语》,1996年第2期。